

夏完淳陈子龙研究的珍贵史料

——读侯岐曾《丙戌丁亥日记》札记

白 坚

侯岐曾（1595—1647）的《丙戌丁亥日记》（手稿本，上海图书馆藏）^①，起丙戌（1646）正月初一日，止丁亥（1647）五月初十日，分装四册。感谢上图特藏部古籍组的帮助，笔者在1988年11月粗粗翻阅了一遍。阅读过程中并得到上图名誉馆长顾廷龙老人的指导。

侯岐曾日记卷前自序云：“乙酉以后，家遭覆荡，……其间岁时阅历，都非耳目恒遭，为宜札记，以备后人稽考”。确实，其中包含了明清之际某些重要人物和事件的极其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以夏完淳为例，有关资料，即不下四十条。笔者搜集、探讨夏完淳的生平及其作品四十余年，在一部著作中得到如此集中而丰富的收获，是十分罕见的。

兹就夏完淳及其师陈子龙的若干重要资料，结合他书，写成这篇札记，以供海内外同好参考。未当之处，还请教正。

一、关于夏完淳的家庭

《日记》述及夏完淳的父亲夏允彝、母亲盛夫人、姐姐夏淑吉以及从兄弟夏平南、昇略。

（一）夏允彝

夏允彝曾寄居嘉定虬江，易名黄志华 《日记》丙戌正月十三日云：

先是璩公依予虬江陈房，已改姓黄，名志华。时惟恐声迹少露，朝夕密通往来，止裁竹纸一小幅，缄题必呼黄老，予则久号半生主人矣。

允彝避居嘉定，在乙酉(1645)义师失败以后，《紫隄村小志·江村杂言》述夏允彝事云：“松郡兵起，先生避居上谷别业，撰纳言本传。常手书云：‘一家大小俱累吾女，生男勿喜女勿悲，信然矣。’”

《紫隄村志·流寓·夏允彝传》亦云：“允彝举义守城，兵败，隐姓黄，依女淑吉，逖居江村之袁家衡。……居江村，自知不免，乃著《幸存录》一篇，授其子完淳曰：‘予从殉难 诸公 九京 游矣’。复作侯通政峒曾传。九月，投崧塘死。”正可互相印证，《日记》证村志的真实可信，而村志则补《日记》的话焉未详。

据《紫隄村志》，虬江系自虬江桥北经临界桥而入崧塘的水道，袁家衡为紫隄村西北诸村之一，去虬江甚近。可见侯家的别业陈房当在袁家衡或其附近。再从此志所附《盘龙塘北水道图》所示袁家衡邻近崧塘，还可推断允彝自沉之处就是嘉定的崧塘，而不是华亭的崧塘。

夏允彝的藏书和遗著 《日记》丁亥二月初六日云：

适为榷楼书籍，皆璩公手泽所存，将命两儿整顿一番，以防鼠穿虫蠹，而吾亦欲借观数种，以却病魔，因特遣一札，与荆隐相闻。

初七日云：

泓入城，沅亦与同入榷，专为书箱故也。

初九日云：

正午膳，而沅从榷还，知荆隐。妙指为暂避王庵俗境，亦过榷居。吏部遗籍，沅遂得捆载，几于床上书连屋矣。予与子侄检点，日以不暇，似乎闲中着忙，其实忙中着闲也。

初十日又云：

是夕检书毕

从这些记载，可知允彝至嘉定依女淑吉(号荆隐)时，所藏典籍亦随载而来，动乱中犹爱书如此，学者风范，令人钦仰。槎楼是侯家在槎溪镇(即今南翔)的别业，看来允彝身后，淑吉珍视这批书籍，特为移藏于此楼。从堆积“连屋”，三四人整理至次夕始毕，可见卷帙有相当数量。

《日记》丙戌八月十五日云：

存古……出瑗公手订《通鉴》五帙见示。

可知允彝所著除《禹贡古今合注》、《幸存录》外，尚有《通鉴校订》。

夏允彝言论点滴 《日记》丙戌二月初三日述侯家田产“籍没究竟不免”，继以慨叹云：

回思缓公“一步紧一步”语，可为寒心。

“缓公”系“瑗公”之笔误。所谓“一步紧一步”，当是清兵渡江后，允彝(号瑗公)关于清朝统治者对待江南土族的政策和策略的判断。语虽不全，吉光片羽，弥足珍贵矣。

(二) 夏夫人盛氏

《日记》丙戌正月初一日云：

夏夫人复遭南塘大掠。除夕，投予新亭宿。元旦觅明，瞥迁陈园。陈园者，予媳未亡人新置一廛也。朱明没夫妇，守宿其中。此夕，呼明没同饮，谕使速徙。

允彝逝后，夏夫人盛氏仍回华亭曹溪居住。此际因环境不安，复投嘉定而来。事先未联系，在除夕突然到来，可见情事紧迫。新亭是侯岐曾新建的住所，地处农村，距槎溪镇不远。夏淑吉则从龙江移居于王庵(在厂头附近)，有时住槎溪镇的槎楼。陈园，既是淑吉新建的住所，似在槎溪或厂头的邻近处，其详待考。“瞥迁”有暂居之意。从《日记》下文的记载看，不久以后，盛氏即移居于槎楼或王庵矣。

《日记》丙戌正月十八日云：

泓往观夏夫人祝发。夫人此来，元与吾媳有空门之约，庶几不愧庞孀也。

下文还有“邀夏夫人，力辞”的记载，可见其清静自守，不欲多所烦扰矣。

（三）夏淑吉

夏淑吉是一个具有过人识见、非凡才干的奇女子。《紫隄村小志》、《紫隄村志》、《太仓州志》、《嘉定县志》及侯玄涵《吏部夏璠公传》等记载她不但为允彝谋画出处，操持侯、夏两家事务，而且公公侯岐曾、太姑龚氏、庶姑刘氏先后殉难，都由她料理后事。《日记》所载的细事末节，则为她的生平作了具体而微的补充。

从《日记》可见，淑吉尊敬阿翁，先后馈送新笋和蜡梅、水仙；岐曾也很看重和关怀儿媳，不时与论家事国事，或投以书札。翁媳之间的这种往还，是当时仕宦人家所罕见的。

侯岐曾为侄侯玄澍聘定盛蕴贞（夏夫人盛氏之内侄女），即由淑吉为作冰人。《日记》丙戌十月廿九日云：

将为吾侄议婚盛氏，先托荆隐通词。是日，召来与商。

荆隐多作郑重语，予谓：“知有蹇修，不知有灵氛也。”遂订即日亲往。

所谓“郑重语”，其意当为侯家正处于艰难之境，事之成否未敢必也。“蹇修”为古之贤媒，“灵氛”则为古之善占者。侯岐曾之言，既表明不计成败、无所迟疑的态度，也暗含对淑吉办事才能的信赖。如果淑吉不是学识丰富的才女，阿翁不会使用这样典雅的语言。淑吉果然不负所托，十一月廿七日的《日记》中，又有“荆隐松回，持吉庚至，知姻盟果谐，破态作喜”的记载。

丁亥三月谢尧文通海事泄，四月吴胜兆反正事败，淑吉密切注视事态的发展变化，先后向侯岐曾通报所获松江消息，在《日记》中均有记载。

(四) 夏平南和夏昇略

完淳是独子，并无兄弟，《日记》所述及的夏平南和夏昇略，当是他的两位从兄。平南、昇略是字号，其名不详，其父名也不详。他们和侯岐曾父子交游，自是由于完淳和淑吉的关系。

完淳和他俩，看来相处很亲切，尤其是平南，侯岐曾设宴邀诸人交流通海事，平南亦同完淳在座。又吴胜兆反正事败后，《日记》有“夏氏平南无恙，犹以幸罗织之未密”语，可知平南亦曾与闻反正事。平南平日熟谙事务，善于折冲，成为侯家谋解征敛诛求之苦的依赖者。《日记》丙戌六月十八日云：

早闻存古兄弟，已于昨暮抵槎楼矣。亟遣力弛札，而昇略、平南已先至庵中。泓留夜酌。予发昆使，薄暮始挈枋赴之。酒次都述吾家诛求之苦，而不暇及它。盖平南于此为熟路，就商肯綮故也。

其后平南，屡至槎溪，应侯家之请为奔走于嘉定、松江、苏州之间。然《日记》丙戌七月初九日有“平南行事委曲支吾”语，“委曲”意谓委琐，“支吾”犹言含糊其词，其人风貌究竟如何，尚俟别考。昇略也曾再至槎溪、王庵，惟未详所事。

二、关于夏完淳的经历和活动

(一) 丙戌丁亥间夏完淳行止概况

据《日记》所载，完淳在丙戌正月十一日或稍前一二日来访侯家，十八日离去，下榻之所当即槎楼。此行任务《日记》正月十八日云：

存古此来，说钱不识父母议婚，势在必谐。泓料理及门帖付之。

“不识”系完淳内兄钱默之字，所议事则未详。

《日记》二月初五日述南都义兵围城被歼事，有“存古所传即此一说，无复他望”语。玩语意似非书信“所传”，或系此际完

淳即在近处，曾与面对。当时夏夫人既居于此，完淳往来探望，自属常情。

据《日记》丙戌五月十四日，“得夏存古信，知初二日，曹溪又遭扫荡，“扫古堕水仅全”。五月十六日，又有“泓云，存古飘摇无所，便拟卜居吾乡。吾与净云谋，先令安顿槎溪，再图他就”的记载。接着，完淳六月十七日傍晚抵达槎楼。《日记》七月至十一月，每月都有关于完淳的记载，大致可见在丙戌年内他一直寓居于此，常在邻近活动，即或曾去他处，也是很短暂的。

《日记》丁亥正、二、三月，未见道及完淳，直到四月初三日始有“据荆隐口传及存古笔奏，云间如有剋日奇举”一语，可知前此一段时期他身在松江，究竟何时去松，未见明文，难于断定，按习俗推想，不会早于正月中旬。当时完淳妻钱秦篆住在嘉善父母处，完淳很可能至嘉善度岁，正、二月返回松江。

弄清楚完淳行止的大致轮廓，可以判断他毁家纾军，入吴易军为参谋的上限为二月上旬，下限为四月末，他在吴易军中，最多也不足三个月；可以排除他在丙戌、丁亥这两年有远游湖、湘的时间；还可印证他的“我欲归来振羽翼，谁知一举入罗弋”的诗句的内容。

（二）夏完淳和侯岐曾的交往

侯岐曾极其尊重夏完淳其人其文 《日记》提及作札作字“与存古”者凡数见，其中录存了丙戌五月十六日、六月十八日两札。五月十六日《寄夏存古》全文云：

仆竟作世外人，闻尚有以世中法相绳者，一切听之。至如仆与存古惟当世世相喻以精微，以故手札再颁，未具一答，而不自以为可怪也。匡圉陈厄，何图再逢。睇望曹溪，眉百攒而肠千结矣。然披讽新诗，句句光明洞彻，此宫音也。岂谓于变徵得之！意为公子复国之兆，羽林孤儿何足以云！惟是“底着滯淫”，子犯所戒，千万速为徙运之图，已嘱贤姊、

豚儿促驾，仆不饶舌矣。山公之义，曷克以当；稽公之思，何能已已！把笔凄断。

六月十八日《与夏存古》云：

一切寒喧都不叙。槎市尘嚣湫隘，姑取其“奔而易达”，又所云“休以择利”，则无不可。本意慎密之至，并不欲先戒庄守之僮仆，乃今仓卒间并未及骚除，不重贻主人之芒蹠乎！专驰急足，告此不宁。如闻贤昆同来，恐未的，不敢具启。旦晚切勿轻移玉趾。贤姊大为虐魔所困，而昨忽衰止，此真佛力护持，惠连可以安心矣。萧山吉语，先望示慰。

两书情意拳拳，优礼甚至，洵为夏完淳研究的极其珍贵的文献。侯岐曾文传世甚罕，两书是可以窥见其生平风貌的文字。完淳颇好古，岐曾则以“博览工文”著称，所以两书多用典实。“山公”谓山涛，“稽公”则为“嵇公”之笔误，谓嵇康。山涛，字巨源，为冀州刺史，能甄拔贤才，转移风尚。与嵇康善，康“坐事，临诛”，谓子绍曰：“巨源在，汝不孤矣”（见《晋书》本传）。完淳来书当引山涛喻岐曾，表崇致倚托之意，所以有“曷克以当”之语。“子犯”为晋狐偃之字。“底着滞淫”，“奔而易达”，“休以择利”，皆晋文公在翟时，狐偃相告之语（见《国语·晋四》）。“底著滞淫”谓困顿久留，乃劝其从速迁移也，“休以择利”谓权且安定，再别作良图也。“骚除”即扫除，“芒蹠”谓荒怠惭愧也。用此等词汇，作此等语气，可见其尊重之至。侯岐曾此际已五十二岁，而完淳年方十六，相差三十六龄，既属至亲，又居晚辈，其所以尊重如此，实缘完淳其人其诗在他心目中处于特殊地位。他盛赞完淳的诗“光明洞彻”，许为“宫音”，称为“复国之兆”。原来古代将音阶分为宫、商、角、徵、羽，称为五声，又称五音。又因感情表达的需要，出现两个变音，即变宫、变徵，总称七音。“宫音”是最重要的主音，《乐记·乐本》将五音和社会现象联系起来，提出“宫为君，商为臣，角

为民”之说。根据传统审美观点，所谓“宫音”，无非指通常的平和中正之声，而“变徵”则指乱世的悲壮之声。此书中以“宫音”称完淳诗，又谓于“变徵”得之，当指于乱世之音中呈现出治世的恢宏之度、开朗之风。“羽林孤儿”，见《汉书·百官公卿表》，“取从军死事之子孙养之，羽林官教以五兵，号曰羽林孤儿。”允彝殉国后，完淳尝以“羽林孤儿”自喻，故书中有“羽林孤儿何足以云”语，表示对他的高度赞许和期望。《日记》论完淳诗屡见，如丙戌五月十四日所云存古“新诗大自可人”，五月十八日《与泓》书所云“存古诗，甚忆之，再从翼王索来”，八月十六日所云“存古出近著诗文，尽日相赏”，可见其赞赏之深。

侯家所受征敛诛求之苦，激起完淳的同情和愤慨 丙戌八月初，地方官谋籍没侯氏家产，即将具题。前此侯家为求宽假而献于地方官的资财，皆付于流水。此时适降清后官弘文殿学士的李雯返回松江，夏平南遂设计由完淳作书求助。《日记》八月初六日有“入槎，晤平南、存古，商所以浼李舒章者，词旨不能殫悉”之语，初八日有“存古至，亦出所上李弘文书，情文斐蔚，或堪动听耳”之语，所以云“亦出”者，因岐曾亦有致李书也。完淳书，即集中之《与李舒章求宽侯氏书》，足当“情文斐蔚”之誉。十四日又有“李弘文发书流涕，许必援手，方养痾谢事，不能身至吴门，已遣其令弟令明及蔡服葛约望日到槎相会，先署印而后抚院，期于得当乃已”等语。

（三）夏完淳的通海活动及其与两案的关系

夏完淳奉表通海及由此而被逮就义，有集中诗作、史书记载和清朝档案足徵，而《日记》所记述的点点滴滴，有可充实内容者，有可资印证者，还有提供新的情节和细节，可借以窥见真相和全貌者。

夏完淳是通海的倡议者 《日记》丙戌三月廿日云：

见存古札，嘱通海南音问。几几慎之。

所谓“嘱通海南音问”，所指当有两层：一是寻觅通海的使者，二是作书寄于海上。看来兼含两义，但首先指物色信使言，因侯家影响大，接触面广也。“几几”为安重貌，或盛貌，用于此处，自是强调“慎之”，犹言切切也。次日，又有“侄出废文秘祝，亦犹存古意也”一语，侄谓侯玄儻，峒曾季子，长完淳七龄，同膺国难家仇，同具奇才壮志，宜乎同怀通海之思也。

顾咸正（字端木，号弦斋，昆山人）也是积极图谋通海的志士。他和侯岐曾既是好友，又是儿女亲家——他的长子顾天逵（字大鸿），是侯岐曾的爱婿。他任延安府推官，间关万里回到家乡后，曾寓居嘉定的泾南（当亦侯家之别业，顾天逵所居），与槎溪相去不远。《日记》关于他的记载很多。丙戌六月十七日，述其来信“累累数千言，大都策中兴之必可期，目前举动，力劝吾辈勿过于畏慎”；九月初一日，述及他的《孤臣血笔》手稿，“大抵援据古今，策中兴之可必”，并谓“其不死于贼，不死于□，果觉养身有待”，“予私幸生平水乳，验之岁寒松柏，真称无负”，“今日留此一俊人，颠沛中亦可无憾矣”（白坚按：“贼”指农民军，当时士大夫类多如此；□处则挖补成空白，从上下文及个别遗漏未挖之例可知，原为“虏”字）；而九月初六、初七、初八日所述，皆关涉通海事：

午余，彭子上至，知有海上一行。予令沅陪至泾南，便留酌。仍宿甲乙轩。

早，端木来看子上，遇雨留矣。适昆阳家信至，知海南使者，约端木茸城一晤，匆匆告别。

早，……公对、渭师入觐吾母，坐谈良久。予始得出陪，仍出外，与子上一谈。公对、渭师小饮别去。时弦斋方缮写书疏，专为海南之举，且拟恣史存古一往。沅亦拟同大鸿入槎。而存古恰同平南至。予因设小具于泾南，使诸君得面相

谘尽。时子上亦遽作松江计。

将此三天所述情事综合起来看，有两条线索：一是彭子上（其人其事待考），似刚从海外归来，连日与顾咸正密谈其事，侯岐曾所以设具于泾南，盖以顾咸正从茸城（松江之古称）匆匆归来，正在泾南住所撰写书疏，便于共商也；另一是“海南使者”，在松江约见顾咸正，顾赶作书疏，当系交其带回。两者之间，似可能有所关联，彭子上或即偕“海南使者”同来，也未始没有可能。《日记》所未及者，也可以推想而知：顾咸正对完淳必然有所了解，或者东归后曾有所接触，因而才引为同调，才有“怱臾”（即“从臾”，与“怱愚”通）“一往”之意；完淳久有此心，虽未立即同往，势必撰写书疏，一并寄送。子上既急赴松江，他们的书疏或即由他带交也。

谢尧文通海案的新资料 谢尧文通海案的本末，既有曹家驹（松江人，夏允彝弟子）《说梦·谢尧文》、朱溶《忠义录·三顾传》及《松江府志·谢尧文传》的记载，又有清内阁档案中的《吴达海题本》和《洪承畴题本》的叙述，业已大致清楚；顾咸正、夏完淳、侯玄静各有书疏寄送，是通海案的首要人物，也已确认无疑。《日记》则为此案留下了极其珍贵的原始记录，提供了确凿可信的佐证材料和具有史料价值而又从未有人道及的情节和细节。

《忠义录·三顾传》谓谢尧文为上海学生，“坐事系狱，峒曾救出之”，《日记》则详细记述其人先后过访侯家的原委，情事若合符节，差异处只不过姓名作“王哨长”而已。丙戌七月廿六日云：

是日，有“王哨长”者索见，予令沔出见之。自云：去岁乡兵指为须党，被缚，赖先通政察其冤而释之。自此飘流海上，达于舟山。遇陈澹生（名素，向为州守。），初受隆武兵垣之命，潜至此中，为联络计，彼久入其幕中矣。

以下历述“舟山事”、“湖中事”、“浙东事”、“上流事”甚详。十月廿三、廿四、廿五日云：

泓傍晚至，说“王哨长”正过东头，述崔将军（芝，日本驹马）果已领倭兵三万入浙，温、台、宁、绍间，大见诛戮矣。（肃虏亦领倭兵三千，而与崔微不协，此尤非所愿闻。）是夕，汧亦为泓拉去。

汧携“哨长”来，予之一饭，晚而大鸿置酒召去。

智舍所寄，今日已就，“哨长”别去。

这位“王哨长”与侯岐曾及其子侄原不相识，让他往来于东头之恭寿庄和槎溪附近之新亭，且让顾天遑召往泾南共饮，可见对他的信赖。侯玄澂所作书疏，交他带去；顾咸正时住泾南，召往共饮时，当有书疏相托；完淳是月十九日方同侯玄泓、玄澂由新亭入王庵，在“王哨长”在此停留的三天间，自有与之相见的时机，亦当作书疏付之。盖《日记》所记，乃侯岐曾所亲见亲历者，不能一一备述。记事虽有详略，与清档案所云并无不合也。至“王哨长”云云，自是代称，当以其关系重大故尔。王、谢为晋代士族名门，或因此以“王”代“谢”云。

令人惊訝不置者，是《日记》丁亥三月廿二日的记述：

吾母二子，方团聚于斗室中，外间忽传有远客至，一钦、（苏州。）一吴，（徽州。）为报“王哨长”被获于柘林，供出多人，如顾，如夏，俱不免，马兵即日至矣。相顾愕眙，莫辨此中机彀。泓先出见此二人，汧亦与陪夜酌，其说凿凿，且云：“柘弁不得自主，即日申吴督。”此时惟以托戴务公为急务。端老、得和俱至，私与吾侄相对，所商惟挽戴一策。予闻信后发热，都付邯郸一梦。此固病态，不敢自云泰定也。是夕，狂霖彻旦，天怒未已，乃至于此。

与《吴达海题本》相较，钦即上海诸生钦浩，吴即徽州商人吴成林。谢尧文在是年三月十九日在柘林被获，钦、吴二人在二十二日

即赶到侯家报信，可见事发时二人当在柘林，闻讯始脱逃也。从后此的《日记》中可知，就在二十三、四日，昆山差官搜捕顾威正，“缚其一仆”；侯家托张鸿磐（字子石）转求戴之隽（字务公），得松江回信，“差官已将发，务公力为营救，幸而得免矣”；完淳此时在松江，“荆隐特从云间飞棹至，则知彼中寂然，且谓吴督近有交情，两家可望无恙云云”，“两家”谓夏、侯也。廿六日侯岐曾概括此事云：

安危倚伏，乃有变幻如此者！此银台之默佑也。然而，倖事不可轻图，匪人不可误托，五昼夜之惊危，亦足为戒也。

夏则先从上寝，顾则不免下行，既以自庆，又念硕交……

廿七日又作《答谢戴务公》，文词颇典雅，有“死而生之，骨而肉之”等语。其实，就在侯岐曾额手相庆，夏淑吉、完淳姊弟欣幸“可望无恙”之时，松江方面，既有人通知昆山派官搜捕顾威正，也有人上报江宁等处昂巴章京巴山、张大猷，他们即据以奏报入京矣。祸机已伏，不待吴胜兆事败而始发也。一个多月以后，正当反正一案罗网大张之时，五月初七日，又有“两日得‘王哨’狱中书，谓纳货可免。以此相邀，异甚，异甚”的记载。此后不久，通海一案亦按籍大索矣。警报屡传，危象早露，惜列名诸人之未能决策远走也。

夏完淳曾与闻吴胜兆反正事 清松江提督吴胜兆图谋反正归明时，经戴之隽的请求，陈子龙曾作书致黄斌卿为介，这是陈子龙被牵入吴胜兆一案的缘由。夏完淳在被捕后哭其师陈子龙的《细林野哭》诗，有“今年梦断九峰云，旌旗犹映暮山紫。潇洒秦庭泪已挥，仿佛聊城矢更飞”之句，用鲁仲连劝说燕将以聊城归齐事喻策反吴胜兆事，然张扬既久，方举事即告失败，所以“九峰”“旌旗”只落得断梦依稀。以师弟间的亲密关系，结合诗意，可以推断完淳事前与闻并寄予厚望。《日记》透露三、四月间完淳正在松江，四月初三日更有“据荆隐口传及存古笔奏，云

间如有剋日奇举。真耶，幻耶？主者岂未戒于漏师耶”的记载。所云“奇举”，即指吴胜兆反正事。这不但证实了完淳曾与闻反正事的推断，而且还表明完淳此番返回松江，即与反正事有关或正欲闻风而动，所以他才在《吴江野哭》诗中有“我欲归来振羽翼，谁知一举入罗弋”之句。

尽管如此，完淳于反正事，不过是与闻而已，引领企踵以望而已，因而关于吴胜兆反正案的《洪承畴揭帖》无一字道及完淳，我们没有根据说他与陈子龙同为吴胜兆谋主，沈起《东山国语补》、娄东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等书所述，恐怕不免但凭迹象而有所臆断和引申，或听信传闻之词吧。

三、关于陈子龙被逮前的行踪

丁亥四月十六日，吴胜兆反正事败。五月，提督巴山、操江陈锦，自南京至苏州，与巡抚土国宝谋兴大狱。陈子龙是首当其冲的人物。《日记》记述了他投奔嘉定、转赴昆山的情况，从中可以看出侯岐曾及其婿顾天遄、其仆刘驯等人之为之尽智竭力，不顾破家亡身的崇高风谊和品质。

（一）陈子龙被逮前转徙过程

据《日记》，陈子龙和夏之旭（字元初，夏允彝之兄、完淳伯父）于丁亥四月廿六日近晚抵王庵。陈字轶符，自是改号“车公”，后更易姓为“李”。

廿七日，“申刻，庵信疾传，车公欲立移其处”，岐曾仆刘驯，家在丰浜，遂令驯归以候。后即用拆字法“呼为川马”。

廿八日，自王庵移丰浜。“车公云，本无短柄落定吴手，只威虜移檄定吴，多借重车公，以是可危。予叩藩近变必有确闻。则云，车公张皇已甚，无暇以及它语也。”所云“威虜”，乃“肃虜”之误，谓明肃虜伯黄斌卿也。“定吴”，谓吴胜兆，以黄斌卿曾将所存“定吴伯”旧印授吴也。夏之旭当于此际返松江。

五月初五日，“王庵正遭苦略，居民兽散。”“丰浜去王庵只三里，川马之邻多所拟议。”“车公计无复之，遽欲行匹夫之谅，川马力挽入槎楼。”

约初七、初八日，车公自槎楼至唐市投故友杨彝，不纳，返。暂住昆山黄泥岗顾氏墓舍。

约初十日，车公在黄泥岗被逮，顾天逵兄弟同被缚。

（二）侯岐曾忘我仗义，置祸福于度外

陈子龙到来时，侯家也正处危难之中，惶惶不可终日。侯岐曾则忘我仗义，竭力为之筹谋，表现出一种非同寻常的雍容器度和坚毅精神。四月廿七日，他在《日记》中写道：

嗟乎！予亦逃死之士，亡命之家也。今即以季布为朱家，张俭为鲁国，万事委连，何暇沾沾计祸福哉！

五月初二日作《与李车公》，全文云：

得闻翁兄此来，且惊且慰。惊则惊大海横流，虽鬻宫蛟宅不得高其枕；慰则慰大鹏海运，回翔容与，姑就鹤鸟而谋一枝之安也。然而此番危机，弟细察究可无恙，我既无行事可蹶寻，又无笔踪可推按，岂有挂名文移，便可悬坐者！但既供耳目，从此不得不过防，将来连染，亦定非一姓，彼以为不除此属，天下终不得太平耳。故弟每以防远不必防近，虑公不必虑独，而翁兄今日气志所动，吾辈之安危系焉。要使精华果锐之气，时时叩存，切勿过于摧塌，若将付之无可奈何者。命世之一人，以为无可奈何，则天下寧真无可奈何矣。长庚晓月，光虽殿而气倍鲜，非翁兄之望而谁望哉！昆阳弦斋氏为弟韶黻交，李于秦中，抗节九死，全发生还，切壮之。归而霸心勇气，不能自固，又时时切讽之。乃此时所进于翁兄者，其说转似蓬樞，亦以为处地既尔不同，居身各自有准，君子以同而异，此之谓也。翁兄以为何如？如弟迂愚老生，理乱俱无所用。迺来一病自废，亦有类托之喑聾者。

然而身则日日悬丝，家则刻刻累卵。只如籍没一案，若彼必欲盈其壑底，惟当索我于沟中耳。而迨日又为风鹤骤惊，尽室奔迸，此时此境，急于布，危于俭矣。今事当极幻，即以布为朱家，以俭为鲁国，此中关捩微妙，正使愚人莫能测识。愿翁兄勿作速徙之图，至祝，至祝。至于地主二字，不为今日而设。但思扶病一来，倾泻情话百斛，其如经年不出户之人，去来动关摹拟，何容直行其意耶！即日呼儿专候，谨先道区区，并稍为从者享越臣之薄脯，坎爻之搏酒，惟翁兄以意不以文可矣。对毫驰结。（有报章，约尔后相通，姓从妨，名从瓠，字大樽。）

自身处于危境，若不措意，从大局出发，转百计慰勉之，振奋之，此诚常人所不可及者。毋怪乎当日子龙曾喟然叹息云：“吾生平交满天下，今日乃知侯氏父子兄弟真人杰也。”②五月初十日，仅作日记十数字，即止。后有侯玄汭粘附册中的片纸，乃侯岐曾初十晚间所作与李车公札的草稿，字迹潦草而难辨，其绝笔也。原文如下：

唐市之行，不遇朱家，便似所问非所对。要之行止久速，莫非天定也。元兄杳然不报，甚异，甚异。儿正驰急足伺的音，而使者亦留之不可得，其往复语尔尔，恐不宜遽回本境矣。奈何，奈何！大兵将入阊境，闻多所征捕，寒家实万分极危，然不暇自计，而亟望吾翁择其所安。真切心事，不出前柬所云，但愧意有余而力不及，更无一条必稳之路。惟吾翁自审择之。

笔者不惮烦地引录前后两札，既出于珍惜史料，亦为了对侯氏忘我仗义、肝胆照人之风稍示崇敬耳。夏之旭曾偕陈子龙出亡，自王庵返回松江，获知陈子龙被逮死难，侯岐曾暨顾天遄兄弟均牵连遇难后，在《绝命词》中有“惜哉子卧，何不早决”之语③。对其辗转牵累，有所致憾。然就侯岐曾言，并非仅只出于仗义助

人，更重要是本于爱国同仇，以整体和大局为重。他的全部《日记》贯注了炽热的爱国复国之情。唯其如此，他遇变不惊，箕踞南向而不跪，破家亡身而不悔，也就可以理解了。

夏完淳、陈子龙以及顾咸正、侯岐曾这些诗人、志士的爱国精神，是爱国主义传统的继承和发展，他们一旦陷入罗网，面对暴力，都表现出宁死不屈的民族气节，永远为人们所崇敬和怀念。《日记》为他们留下了珍贵的记录，提供了人物和事件的背景、概况、情节和细节，有助于对他们的心志、气节和业绩的加深理解。与此同时，《日记》所记述的内容，也显示出这些诗人、志士的弱点或局限性。他们书生气浓厚，警惕性薄弱，对事物的复杂性和艰巨性认识和估计不足。夏完淳、顾咸正等撰写书疏，连篇累牍，付予一人，根本未采取什么防备万一的措施；信使被获，书疏败露，已获确息，处于危境，却倚恃某人掩护，全无戒心。陈子龙为吴胜兆与黄斌卿联系，关系重大，却自以为并无把柄在握；及至反正事败，已无可隐藏，仍犹疑观望，未毅然高飞遐举。侯岐曾在叠获警报、理无可留的情况下，仍然株守家园，坐待鹰犬。凡此，都充分暴露了他们的弱点或局限性。尽管这些，并不影响他们的事迹和精神的可歌、可泣、可敬、可佩，然后世论者，有见及此，实不能不为之扼腕、长太息也。

注：

①乾隆《嘉定县志·艺文志》著录侯岐曾《丙丁杂志》一书，是否即《丙戌丁亥日记》，待考。

②陆元辅：《明故太学生侯雍瞻先生私谥弘义议》，《陆菊隐先生文集》卷十六。

③徐秉义：《明末忠烈纪实》。

1989年8月6—11日，于南京。

作者工作单位：江苏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